

史學彙刊 第二十三期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臺灣武俠小說中的歷史建構 (1951~1991)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盧建榮

- 一、前 言
- 二、嗜殺取樂、到處行搶的日本盜匪
- 三、變調的國族論述
- 四、操作精緻的歷史元素
- 五、下層社會意識型態的躍動
- 六、結 論



摘 要

本文就台灣戰後五十年的武俠小說文化工業中的歷史建構此一現象展開研究。在眾多武俠文本中，本文發現發生在元、明、清三朝的武俠故事裡，為數極多的作家其歷史知識資源來自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在這裡，武俠小說作家讓原本發生於十九世紀最後十年才有的新生事物，即國族主義，提前出現。這一類小說家，我以司馬翎為代表進行文本分析。司馬翎的故事基調固然是國族主義，但他的文學創作才華高於同儕的關係，在華夷對抗的故事主軸中，不至過於刻板或單調，漢族英雄的對手，不論是蒙古人，或是日本人，還是有人格高尚之輩，博得讀者好感。司馬翎的歷史場景充分暴露他對元明清旅店設施和旅遊知識的欠缺，還有，他不知元末江南漢族文化菁英是親元廷的，另外，他對明季倭寇的認知停留在抗日論述的範圍。武俠小說家對歷史場景及相關知識博通者少之又少，唯一的例外是雲中岳。本文指出，雲氏對明代旅遊知識的掌握，以及對清代殖民主義的認識，都走在專業歷史家學術議程表之前。這是緣於雲氏刻苦自學的緣故。有助於雲氏寫作的歷史知識既與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無關，也與台灣歷史知識社群不同調。

關鍵詞：異族書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歷史知識生產、歷史書寫、抗日論述、國族論述、反論述、國族主義霸權論述、文化論述、文化工業



一、前言

臺灣的武俠小說從一九五一年後開始大肆生產，有三百多位職業作家¹，十餘家出版社、數家中盤商，以及約三千家的租書店，構成一時無兩的文化工業²，餵養了上自教授下至販夫走卒的、數以百萬計的消費讀者群。迨電視普及到家家有之的地步下，才改變了臺灣人的娛樂方式，從此，閱讀武俠小說，以及觀賞電影這兩種娛樂的主流走入歷史。電影還好，到了二〇〇九年，它仍是臺灣民眾種種娛樂方式的一種，只是退居主流位置；至於武俠小說的市場萎縮之後，早已日薄西山，難以為繼了。當一套小說的賣量不到一千本，甚或只有五百本的情形下，武俠小說的商品價位淪沒至此已成定局，至此地步，寫手遂紛紛封筆，出版商自然視之如蛇蠍，再加上閱讀長篇說部的人口持續低迷等等因素，均使武俠小說所構築的文化工業為之煙消雲散。

基本上，一九八〇年代末，兩位武俠小說名家，即古龍和司馬翎，双双凋零，就預告了本土武俠小說創作的遠景不再了。抑有進者，八〇年代初，臺灣引進了超級武俠小說明星金庸的作品之後，更擠壓了其他武俠小說家、以及出版非金氏武俠作品的出版商其存活的空間。時序進入九〇年代，猶在勤於筆耕的武俠小說名家只剩下雲中岳一人。雲氏可說是台灣武俠小說文化工業的殿軍人物。二十世紀武俠小說走入歷史，大概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武俠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上俗民文學的一種，一向不見容於廟堂文學，同屬說部，它的地位就不若文藝小說高。這點是雅俗之分的議題，本文暫置勿論，本文要探究的是武俠小說故事場景離不開古代中國的歷史場景，特定歷史知識與特定文本作者的創作之間形成不可或缺的關係。但武俠小說家所運用的歷史知識又與現實的歷史知識生產，以及國家意識型態息息相關。武俠文本往往蘊藏豐富的國家掌控歷史知識生產的訊息，值得細究，以解答文化生產與國家權力疆界的關係這一議題。本文將以有代表性的武俠小說名家為例，來說明與此議題攸關的具現於歷史書寫中的兩種文化模式。

1 參見葉洪生〈從美學觀點比較港、台武俠小說之異同——以梁羽生《白髮魔女傳》與臥龍生《飛燕驚龍》為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辦的「國家政策與通俗文化」第二次研討會（1997年1月6日），頁1。

2 參見盧建榮〈製作中國性：司馬翎和雲中岳及其本地追隨者〉，收載氏著《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臺北：麥田，2003年），頁50。



二、嗜殺取樂、到處行搶的日本盜匪

武俠小說名家之一的司馬翎生涯著作中有兩本是以明季沿海倭寇侵擾中國為背景，一本是寫於 1964、1965 年的《金浮圖》，另一本是寫於 1976、1977 年的《情俠蕩寇誌》。異族入侵的主題通常是作者大展其國族論述的淵源所自。《金浮圖》文本的故事場景安置在山東的威海衛，是大明帝國的一個軍事據點。日本浪人武士會去攻打該軍事據點及其附近鎮市，完全脫離經濟考量的孟浪之舉。那是由於軍事據點也好，鎮甸也罷，都不是日本浪人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性選擇。揆之史實，日本浪人不至浪擲其軍事武力若此。這是文本作者的歷史想像無法扣緊歷史實情必然的結果。他並不清楚十六世紀中國沿海的海盜是以中國人為主，日本人只是其次角色。³有謂「倭寇橫行」云云，是違反史實的說法。應該說是中國沿海下層社會嘯聚為亂才是⁴，在此，國際貿易層面的比重較小。但國際貿易的層面是這個海盜崛起現象的觸媒，故爾也不能說它不重要。畢竟海盜是靠國際貿易營生的一群人。然而，這個國際貿易的經濟需求被明廷以政治理由強行壓抑。因此這個貿易就流為地下化，成為走私貿易的形式。⁵倭寇問題的產生不在於日本商人的橫霸，而出之於中國海盜不同股之間暴力搶奪的行為，而輸的一方就會以打劫來彌補貿易上的損失和維持生計⁶。另外，海上私梟一方面接受外國人（如日本人、葡萄牙人）投資，另一方面他們需跟陸上有合法身份以為掩護的商人的合作，然而，一

3 參見田中建夫《倭寇》（東京：教育社，1982年），頁15~20。清·古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第一集40種中，1956）卷55，「沿海倭亂」一條，從頁127起，敘從嘉靖25年起至頁143，即嘉靖43年止（1564~1564）。作者以含混的「倭寇」一辭，敘寫海盜之亂，看不出海盜組合中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主從關係。近代日本史家於此則毫不含混。

4 參見李洵〈公元十六世紀的中國海盜〉載於《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76~578；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貿易商人與倭寇〉《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

5 參見陳文石〈明嘉靖年間浙福沿海寇亂與走私貿易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本上冊。2008年美國作家Fareed Zakaria出版*The Post-American World*一書，內中引用名經濟史家的研究成果指出，從十六世紀起，西歐的人均年產毛額即超越明中國，到了十七世紀高出明中國百分之五十。在此可推知明季中國人的海外貿易能力正下降中。本書由麥田出版社於2008年中譯本，前述看法可參見該譯本頁76。

6 參見張彬村〈十六世紀舟山群島的走私貿易〉收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年），頁87。



且合作破裂，海上私梟就會不堪賠累，而被逼走上搶掠一途⁷。

文本作者對於明季海盜問題中，日本人扮演無足輕重角色這點不解，只是問題的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是，他對於傳統中國聚落結構和旅遊設施同樣不甚瞭然，就在他大肆從事異族書寫行動中暴露無遺。再回到《金浮圖》文本來作例解。該文本將倭寇寇擾地點集中在威海衛及其附近城鎮。隨著主角薛陵行抵威海衛，作者如此描述威海衛：

那時候〔按：指嘉靖三十三年（1554）〕，此城修築未久，城內居民還不甚多，不過由於常年有重兵駐紮，故此市面還算熱鬧。⁸

這樣介紹威城，還算中規中矩。

在文本中，作者還提到兩個鎮市，一處沒有名字，另一處叫老窰鎮，這兩鎮相距數十里。先說那個無名鎮。倭寇侵擾該鎮的情形，透過主角薛陵一雙眼睛呈現在讀者眼前：

遠遠已見到鎮上失火數處，一片兵荒馬亂之象。途中曾經碰到許多附近鄉村逃難的人，但這刻到了切近，反而不見有人打鎮內奔出。⁹

接著作者運筆轉往主角薛陵內心的描摹，如下：

薛陵胸中熱血沸騰，殺氣填膺。他料是鎮上居民定必完全被屠殺精光，才無一人奔逃。¹⁰

然而，薛陵的判斷是錯誤的。薛陵冒險進入這個被倭寇暫時佔領的鎮甸，出乎他意料的是該鎮的損失輕微，作者如此描繪其事：

（薛陵）四下一查看，此鎮只損失了不少糧食牲口，以及由鎮長向各戶攤派的一筆錢財，又焚燬了三間房屋而已，一個人也不曾被殺。¹¹

接著，文本作者調筆去寫薛陵內心的欣慰，如下：

薛陵心中自然十分安慰，暗想這是石田弘部勒得嚴，所以向來以屠

7 同上註，頁 88～89。

8 參見司馬翎《金浮圖》（臺中：文天出版社，1982 年 12 月）第一集，頁 189。請注意本文引文的出處全來自不法書商的盜印版。這與文本真正出版年和原始有版權出版社版本有異。既然當年武俠小說原先版本均已失傳，本文只好以尚在流通的盜印本為據了。至於原先作品的出版年全憑筆者當年閱讀的記憶。

9 同上註，第二集，頁 376。

10 同上註，頁 378。

11 同上註，頁 378。



殺爲樂的倭寇雖是佔領此鎮許久，但災情輕微。¹²

至此，讀者總算瞭解文本作者對倭寇此一異族行爲特性的認知是，他們是一群殺人爲樂的人，此外他們的強盜作爲集中在搶財物，包括糧食和牲口。還有，必要的話，倭寇會焚燒中國百姓的屋宇。也就是說，生命的損失是最嚴重的，財產的損失則是其次的。這是文本作者對倭寇『爲害』等級的分法。再從另一種方式說，倭寇向來入侵中國即是以殺人取樂爲主，搶奪財物乃是附加的。

這樣的異族書寫，大違明季海洋史的知識。事實上，海上私梟主要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他們搶掠沿海起始於 1540 年代，與《金浮圖》設定的 1554 年早了十餘年不說，還有發生的地點是在浙海，而不在渤海灣。倭寇侵擾沿海是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沿襲先前抗日論述而來的一種歷史書寫¹³。真正嚴重的一次掠奪發生在 1547 年，海梟團體深入餘姚縣城一豪勢之家（按：該家是與海梟合作的陸商之一）。在這次劫掠行動中，該受害家有九人被殺。這是搶掠殺人，屬於重大治安事件，地方當局掩飾不了。官方爲此彈壓兩年。這不過是走私集團內部窩裡反，有所針對性，並未累及無辜者。到得 1552 年，海梟團體竟然頭一遭攻陷縣城，該城叫黃巖縣。史稱「壬子事件」¹⁴，這給了官方大事鎮壓的理由，從此官方進行緝私達十三年之久，直到 1565 年止。此其間，海梟團體的傑作要數 1556 年這一年大舉入寇浙西沿海和南直隸¹⁵。但海寇再怎麼猖狂，還不致魯莽滅裂到跑去無關經濟誘因的華北威海衛去作案。這毋寧是文本作者滿腦子抗日意識之餘，誇大了寇勢及其作爲。

所以，倭寇行動的主要目標是商業利益，人命非其所要。這點，文本作者的異族書寫恰恰與之相反。甚且，他以爲只要鎮甸的人沒被殺，只是財物

12 同上註，頁 378。

13 這種抗日論述最早出現於二十世紀中日戰爭期間。馬克思學派史家之一的翦伯贊寫有的〈論明代的倭寇與禦倭戰爭〉一文，收載氏著《中國史論集》，頁 215~237。該書原出版於 1943 年，此處所據版本爲台灣翻印本，不著出版時地。到了台灣歷年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第一冊中凡述及明季政治或外患處，就有這種抗日論述。這還是二十世紀一綱一本的時代。到了二十一世紀一綱多本的時代，倭寇仍是這種論調。茲舉明史專家林麗月與陳豐祥合寫的《中國歷史上》（臺北：建宏書局，2000 年）爲例來說明。該教科書頁 165，載云：「嘉靖年間，倭寇猖獗…」專業明史專家都如此附和台灣威權體制的國家政策論調：「抗日論述」了，又何怪小說家呢？

14 參見《浙江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 年，據 1736 年版翻印），卷 134，頁 1 下。

15 參見茅坤〈紀剿除徐海本末〉收載鄭若曾《籌海圖編》（臺北：商務印書館，四庫珍本），卷 9，頁 15 上。



損失的話，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然而，揆諸史實，我們既看不到中日大戰的戲碼，也看不到寇勢有燎原到華北威海衛的。更重要地，官方打擊私梟的能力遠高於私梟團體。私梟團體的劫掠行為出於保本和活命的作為。文本將私梟團體中的客卿——「日本人」——放大，且反客為主。這完全不合歷史現實。身處一九六〇年代的文本作者當然不具備明季海盜史的專業知識，他只配備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抗日論述，就成了他創作的依傍來源。

還有，文本作者對明季經濟的認知也大有問題。中國的聚落分成行政城和商業城這兩類。行政城指的是明廷施政的地方行政體系，有府、州、縣三種行政城；商業城指的是由唐中晚期發展而成的「草市」和「軍鎮」，到宋代則合稱「市鎮」，以迄民國不替。鎮、市等聚落其經濟實力依個別情況而定，同理，府、州、縣城中也有發展出雄厚經濟實力的，不可一概而論。但無論如何，倭寇倘欲染指城、鎮的話，通常一定是富裕的所在，否則所為就不合經濟理性行為。照說當時山東威海衛附近不是經濟發達區，其附近即使有鎮甸，恐怕也不會是吸引倭寇下手之處。相反地，文本作者將倭寇形容成無所不搶、且大小通吃的一種飢不擇食的非經濟動物了。

更要不得的是，倭寇更不會發神經到故意去惹毛明軍，特別是關防重鎮之一的威海衛。《金浮圖》中的倭寇竟然計畫去損毀該衛的防衛力，主要著眼該處有總旗官（只是中級軍官）是個將才，倭寇頭子有意重創該衛，從而導致該軍官因事受懲而喪失權柄。文本又說該衛是中國海岸線的中點，是縮連明帝國沿岸的中樞點，擊破此衛就可讓南、北倭寇合流，並進而與陸路的俺答（蒙古）勢力搭上線。此舉有助於倭寇滅亡明廷。這是異想天開。倭寇再貪，也不過是經濟利益，他們沒有這麼偉大的政治野心。這是文本作者將二十世紀版的日本侵華史提前四百年發生。

倭寇襲擊威海衛一節¹⁶，在《金浮圖》文本中甚為耀眼，中、日雙方的戰陣殺伐描繪得活靈活現，可惜翻開中日關係史，應該沒有這一頁。

對於倭寇大小通吃，無所不搶的舉動，司馬翎在十多年後，於其《情俠蕩寇誌》文本中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抑且倭寇在政治上的狼子野心性格這一點益加暴露無遺。

文本的主角陳希定居住在一個叫石頭村的漁村，該漁村滿佈地道，內中可存糧十天、半個月俾便抵抗倭寇入侵。這又可見倭寇連個貧窮的漁村也不

16 同前註8，頁223～242。



放過的光景。陳希定深悉土木工程之學，故爾可以領導漁夫完成這個縱橫錯落的地道系統。這樣的故事編排，有一點暗示：那就是，石頭村的漁民在困於生計之餘，還得「全民皆兵」地勤挖地道，以便完成這個足可抵禦倭寇的防衛系統。這樣的防賊措施不知要花費多少金錢？還有，作逃離之計似乎強過藏身地道作困獸之鬥，而且更何況付出大量勞役，這於生計實在大有妨礙。這樣作為不敷經濟效益。這種涉及經濟理性的事，也不在文本作者於從事創作時考量之列。更重要地，倭寇選擇一個窮漁村作下手目標，並與該村民耗個十天、半個月的，所為何來呢？上述疑問暴露了文本作者輕率為文的疏失，同時也彰顯了一個事實：讀者的閱讀癖性根本同作者一樣，不具該有的經濟理性思維，或者說，讀者自有其閱讀趣味所在，毫不受經濟這一因素的干擾。讀者是讀不出此處筆者所措意的地方的。

文本是寫到石頭村遭襲的情景，不過不是倭寇，而是與倭寇有所勾結的中國海盜，一個名叫「五船幫」的海盜集團。類似的幫派在文本中還有一個，叫「海龍會」。本書的倭寇都以個別身份加入中國海盜集團充當幹部，未見有組織性的股匪形式出現的倭寇。在歷史現實世界中，海梟團體的確有船團組織出現，每一團體擁有數十船是常有之事，而且每一團體的首領就叫「舶主」¹⁷。文本的歷史想像有點趨近真實歷史世界。在歷史現實面上，日本海上武裝商人集團是與中國閩浙沿海海盜集團有所合作，但不是如文本所說，合作到入人幫派去充當核心幹部，而且握有大權的。

石頭村的地道網路誇張到與府城地道網路相連¹⁸，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為了抗倭，難不成中國沿海各府全都建有四通八達的地下道系統？這樣的工程將耗費多少人力和物力？這些恐怕都不是異想天開的文本作者所計較及之的。更重要地，筆者必須指出，讀者的注意力不在這裡與時代制度、背景有關的歷史專業知識。

石頭村轄於浙江台州府，文本是這樣編故事的：台州府這項偉大工程經文本中五船幫一位船主之口如此道出：

「最近老船主得了一項情報，說是這台州附近的沿海城鎮，有人設

17 參見張彬村前揭文，頁 81。

18 參見司馬翎《情俠蕩寇誌》（臺北：皇鼎文化出版社，1998 年 8 月）第一冊，頁 40，言及主角對匪首說：「我家地道與本府所有人家的地道相連，成為石頭村的地道網之一，……」



計地道以逃避海盜的劫持，不想咱們卻在這石頭村發現果有此
事……」¹⁹

文本作者還將中國閩浙沿海海盜的貪婪想像成對明政權的垂涎，而不僅僅是受海上貿易利益的引誘罷了。此事經文本中男主角陳希定與另一位女配角的對話窺知，如下：

陳希定道：「海龍會？一定是橫行江浙一帶的海盜幫派，他們為什麼跑到這附近來？」唐英說道：「海龍會會主老神君雄心勃勃，看來有意聯絡山賊和海寇橫行全國……」²⁰

這樣情節的鋪排就把騷擾一方的海盜升格成要奪取大明江山的一股政治勢力。這又是作者的想像，而與專業歷史知識體系的距離遠甚。

陳希定離家前赴杭州途中，沿途所經村／鎮均因倭患而殘破不堪。在他快到餘姚縣城途中一座村落，文本作者如此形容該村：

他走進村內，不料卻發現村內空無一人，靜悄悄的，竟連一絲炊煙也不見。²¹

迨主角抵達杭州之後，杭城外某一村莊，竟然被海盜佔領，村民正待引頸就戮。文本將其情景描繪如下：

地上跪滿了十幾個村人，個個面如土色，緊縮在一起。²²

文本作者為誇張倭寇勢力之高漲，竟然編出故事說寇勢深入內陸至杭州府轄境，更誇張的是強盜不在劫財，而在殺人。

杭州城外有一蔡家莊院，是一大戶人家，竟然因寇勢而荒廢，村民相偕逃難而去。這番景象惹得主角陳希定為之嘆息道：

「一定又是海寇搶掠過甚，害得這繁榮的苑院變得無法容身，真是作孽！」²³

杭州府轄的荒廢景致，文本還透過陳希定的對手段裕眼中加以呈現，如下：

越近杭州城，人煙越見稠密，但所有的村莊，幾乎都是十室九空，

19 同上註，頁 53。

20 同上註，頁 158～159。

21 同上註，第 3 集，頁 27。

22 同上註，第 4 集，頁 58。

23 同上註，第 4 集，頁 166。



被海寇騷擾得逃的逃，散的散。²⁴

這又是複製一遍寇勢深入內陸的戲碼，而且倭寇愚蠢到去搶掠毫無經濟利益的窮村貧鄉。一如前述已及，海梟團體才攻陷一縣城，就招惹明軍予以鎮壓十三年之久了。這番由得倭寇攻抵江南都會城的杭州，那還得了？

再回頭去講陳希定從家鄉步入江湖的初期，他走到一個叫姚家集的市集卻人潮鼎沸，他非常吃驚，問了一位路人，這位路人說：

「唉呀！我們這附近三鄉二十四村受了倭寇之害已有一年多
了……」²⁵

原來有位抗倭英雄來將倭寇給趕走，村民這才出面慶祝。

當陳希定抵達台州時，文本作者如此這般描繪這座府城的景象：

這時正是倭寇橫行之際，明廷設在沿海的衛所，久已船敝伍虛，無力作戰。台州府城也是淒涼得很，只靠一些臨時招募的壯丁把守，實力甚是薄弱。²⁶

從以上討論看來，不論行政城，還是鎮／市，甚至村／鄉，都有倭寇蹂躪的痕跡，而且殘破景象到了「廬舍爲虛」的地步。文本作者爲張寇勢至此離譜地步，恐怕是他不解明季經濟史的結果。還有，他不解官方的治安能耐遠高於海梟團體，海梟忙於躲避官軍之不暇，哪有倒過來予官府以威脅的道理呢？

既然千里無人煙，行走江湖的遊俠如陳希定之流，又如何安頓他們的肚腹？矛盾的是每當該當用餐時刻，或是該當棲息時刻，這些遊俠運氣忒佳，都有餐店或旅館爲之解決出門在外的煩惱。

像陳希定離家的第二站是溫嶺市集，文本作者先是說它受到寇害如下：

也許是受了海寇的騷擾，此刻更見蕭條。陳希定信步走進鎮內，竟然發覺一片死氣沈沈。²⁷

但是他還是解決了他的民生問題，因爲：

他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家小館，看來還開著營業。²⁸

24 同上註，第5集，頁16。

25 同上註，第2集，頁69。

26 同上註，第2集，頁181。

27 同上註，第2集，頁46。

28 同上註。



既然市容蕭條，而且人都逃難去了（或者躲在地下道？），如何有商人不顧性命照常營業？作者在此毫無警覺也就算了。等到主角走到海邊要直搗賊穴，不料有碼頭設施的某漁村叫「大鵬灣」，還有茶樓在營業。海濱的漁村應當賊寇之衝，筆者不解當地餐廳究竟是如何維持下去的。請看文本的描述如下：

海邊有座小村叫大鵬灣，有一道長長的海堤和一座碼頭，村中倒也相當繁榮。他們三人（其中一位是陳希定）走進村中茶樓，要了一些點心充飢。²⁹

這樣的海濱村落不但有茶樓，而且還有碼頭、堤防等設施，依史實很難在明代存在，此其一。第二，別說海寇勢漲可隨時進出小漁港，遑論能讓它經營下去了。以上兩點均大違歷史現實，可是作者的欠缺應有歷史知識這點，欲使他大肆其歷史想像之餘，還遊刃有餘對歷史說三道四。筆者在想，這個大鵬灣會不會是作者遊歷臺灣屏東縣東港鎮的經驗而得到的寫作靈感，我有點懷疑。別看筆者屢屢指出文本作者其歷史知識的貧弱，但這不是本文重點，本文重點要在指出文本所潛藏的文化訊息，才是讀者於不知不覺中讀進去的所在。

三、變調的國族論述

胡漢民族接觸的史頁往往成爲史家、小說家耕耘國族論述的最佳田園。司馬翎在其《金浮圖》中從事異族書寫時，竟能跳脫國族主義的窠臼，這點並非易事。司馬翎在倭寇陣營中也能分辨人物之高下，對於英雄人物不吝惜給予應有的讚嘆，而且更神奇的是，作者還安排主角薛陵與倭寇中的英雄產生英雄相惜之感。通常懷抱國族主義的論客只有敵我意識，而不可能看到異族的優點的。在虛擬的縱橫中國沿海的倭寇股匪中，司馬翎特別推崇由一位叫石田弘的日本武士，只因爲他所領導的盜匪集團不事殺人。這點讓威海衛的一位軍官，叫做何元凱，所識拔，認爲倭寇由石田弘所統帥會對沿海居民較爲有利。這位軍人竟然有外交官的思維，深悉從兩害相權中取其輕之理，從而主張支持石田弘的領導位置，不讓以殺人爲樂的其他日本武士來替代石田弘的領袖位子。

29 同上註，第5集，頁152。



何元凱這位軍人的外交思維影響了主角薛陵對石田弘純粹只是異族敵人的觀感。文本敘述薛陵來到威海衛意欲拜師學藝，卻被明軍誤以為是奸細，而被囚入地牢。在身繫囹圄的三日時間，薛陵結識了獄中的一位難友，叫石田弘的日本人。石田弘明白告知，他及其屬下故意入監，為的是要利用監軍使來視察衛所之時破獄而出，此舉將累及明軍中三位將才，其中一位即何元凱。如此借刀殺人之計一旦成功，威海衛將無優秀將才防守，勢必有利於日後倭人的軍事行動云云。³⁰

聞知石田弘陰謀的薛陵很快就被何元凱從獄中提領出來，在何氏曉以利害之後，薛陵不諱言石田弘確在獄中，但仍信守朋友之義不願道出石田的陰謀。這顯見薛陵在國家與朋友之間處於天人交戰的時刻，幸而何元凱也不逼他，並且感謝他證實石田弘的身份。就在何元凱答應釋放薛陵之後，何元凱才道出他對石田弘曲以維護的策略。首先，何元凱指出石田是名人物，以及他所率的股匪是所有倭寇群股中最紀律嚴明者。³¹其次，何元凱指出威海衛的淪陷關係到倭寇南、北群股得以統一的契機，一旦南、北倭寇合流，將成為明朝「無法克服的大患」。³²

何元凱言至於此，薛陵聽畢不得不動容，才有底下兩人的互動：

薛陵不由得微微動容，忖道：「原來如此重要，怪不得石田兄不惜冒大險也要把鎮守此城的將略之士除去，日後便以垂手進佔威海衛了。」

何元凱又道：「除此之外，還有更可怕的陰謀，便是本衛一旦失守，倭寇便可以橫行侵略渤海、遼東灣，大勢所趨，要與東虜及河套俺答部互通聲氣，海陸交侵，大明朝岌岌可危，將淪亡於夷敵之手，只恐連宋代渡江南據的局面也不可得了。」³³

何元凱這番見解固然令薛陵大為傾倒，但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多少可以看出，文本作者將日本二十世紀侵略中國的政治野心提前讓它在十七世紀發生。十七世紀的日本海上武裝商團頂多只想到經濟利益，而毫不及政治野心的。我們且回到文本去看作者如何誇大倭寇政治野心的提法。

30 參見司馬翎《金浮圖》(臺中：天文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集，頁199~200。

31 同上註，頁202。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頁202~203。



接下來，文本作者繼續安排何元凱演講下去，而薛陵於此只能當一位乖牌牌的聽眾，這是因為基於友誼，薛陵不能透露石田弘對其祖國的陰謀。光這一點，可知司馬翎如何跳脫國族論述了。

且聽何元凱說：

「只有石田弘等傑出雄略之士，我才敢作第二個猜，那就是他施用至高無上的離間軍心之法，借刀殺人，把本衛兩三位受軍民愛戴之士害死，然後，他等到本衛因乏人主持而力量微弱之時，才率眾佔領本衛，打通東北與東南沿海之路，他既可因而不傷實力，又增聲望，或可當選為大首領。」³⁴

就在何講薛聽的過程中，很快就進入到何元凱選擇不殺石田弘，而且還有意縱放他的意圖來，且聽何元凱說：

「不過那石田弘智勇雙全，乃是諸倭首領中最是雄才大略之士，我反而不想取他性命。」就在薛陵心有疑問情形下，何元凱又說了：

「……我甚是為本朝良民百姓著想，才不肯趁機除去石田，這石田弘向來以侵掠日本商船為主，偶然犯及本朝疆土，也不過是奪財掠物而去，極少殺人，因此沿海居民每見蝴蝶兵侵至，打的是『石田』旗號時，都大為放心，換句話說，石田氏很得沿海居民心，所以他的行蹤去向最難查究出來，他麾下擁有六艘八幡船，人數逾千，軍法極嚴，他自家統帥一艦，其餘五艦艦長稱為『五虎將』，都是勇力過人脾氣乖戾之士，只服石田統帥，因此，倘若石田被殺，這一股倭寇便將分為五六股，為害之大，難以想像。」³⁵

以上司馬翎透過何元凱之口道出一番針對國族的反論述（counter-discourse），莫說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讀者看了一頭霧水，即令今天看來，還是會認為文本作者此舉不免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揆諸史實：試想，倭寇追求的是經濟利益，而不是嗜殺者，更對中國國土毫無野心。文本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去思考，其一、倭寇如何會出現在非中國經濟中心的華北山東半島？其二、他們倘若有侵佔別國領土的野心，光佔領威海衛一隅，不會引來更多明軍來個收復失土嗎？文本作者一反歷史實然問題，而將倭寇描寫成對他國領

34 同上註，頁 203～204。

35 同上註，頁 206。



土有野心的嗜殺者，反倒對經濟利益毫不究心，才會不惜耗損兵力去攻打威海衛。

文本作者對於情節的編織固然有違史實之處，不過，這不是本文重點，本文的重點在於他的歷史想像和歷史建構。他把文本中的兩位英雄角色，即何元凱和薛陵，描寫成可以跳脫國族主義思維的人。這點相當不容易。抑有進者，文本作者並不因石田弘出身倭寇，而賦予負面人物造型，恰恰相反，文本作者也將石田弘描寫成一位英雄人物。更加有趣的是，文本作者還刻意安排一節讓這兩位異國英雄，即薛陵和石田弘，聯袂冒險，去攻破一處邪惡組織的機關部³⁶。這一情節無關本文閱旨，暫置勿論。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司馬翎再次重炒倭寇劇碼，即在寫作《情俠蕩寇誌》，卻完全無法跳脫國族主義思維。該文本的日本人全是負面人物，個個陰狠狡詐不說，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嗜殺者。這似乎使得司馬翎跳脫國族主義思維一事顯得只是一時例外。且慢，司馬翎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還有一部作品是跳脫國族主義思維，那部作品名叫《纖手馭龍》。該文本的故事背景從明代提前到元朝末年，這次漢族英雄的对手不再是日本人，而是蒙古人。但無論如何不脫異族書寫則一。事實上，文本作者的歷史想像和建構大出歷史實然情境不知有多遠。元末明初的江南文化菁英在處身巨變時代，他們緬懷的是故國元廷，而非勝國的明朝。這讓日後的史學大師錢穆驚詫不已，引為千古未有之奇³⁷。文化菁英並無驅逐韃虜之心，下層社會的群眾更不至對政權誰屬有所措意才對。但這些由專業史家所發掘的歷史知識是《纖手馭龍》文本作者所不知者。亦即，在此專業史家已跳脫出大漢沙文主義的思維窠臼。但是小說家依舊是他當年受國家意識型態浸潤那副模樣。

《金浮圖》中的石田弘應該可以在先前作品《纖手馭龍》中的蒙古人普奇身上看到其原型。元朝末年反元組織之一是窮家幫，該幫幫主的盟弟裴淳是本書的主角。元廷成立了一個叫中秘省的機構，由英宗皇帝的外戚，文本叫他為國舅朴日昇來主持，下轄逾萬手下，之中不乏奇技異能之士。文本故

36 參見司馬翎《金浮圖》（臺中：文天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集，頁259起，至第2集，頁353，可知將近百頁的篇幅描寫這段中日情誼。

37 這種元末明初未見種族革命思潮於文化菁英社群的現象，由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收載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東大出版社，1978年）一文首開其端，分見該書頁77、82、83、84、85、87、89、100、102、141、143、159、162、163以及167等處。這裡沒有親漢仇蒙的想法，是司馬翎想像不到的事。



事的主軸就是窮家幫的反元和中秘省的挺元之間的政治鬥爭，只不過因為是武俠小說，所以鬥爭要以比武的方式呈現出來。普奇率領四位盟弟，分別來自高麗、女真、印度，以及安南等地的武術名家，組成一個綽號「宇外五雄」的工作團隊。普奇本人是官拜萬戶長的蒙古人，他在政治立場上是與朴日昇對立的一方，此其所以站到窮家幫這一邊共抗朴日昇勢力。為什麼會發生蒙古集團自家相殘的事呢？這在書中自有交待。文本中有位工匠，其技藝之高到了巧奪天工的地步，因而被延攬到大內宮禁服役，他向主角裴淳解釋何以普奇要幫助他的原故。這位工匠說：

「蒙古軍官想幫忙窮家幫也不算奇怪，要知他們朝廷內派系甚多，每次皇帝死了，都發生奪位之事……（按：下舉例說明，茲不贅引）因此，有些蒙古人暗助反抗元廷的窮家幫，也有些要消滅窮家幫，這都不足為奇。」³⁸

經過這番解說，裴淳才接納了普奇伸出的友誼之手。

文本中另有一處特別安排男女主角商談普奇團隊入夥之事，如下：

薛飛光道：「元廷得到此人（按：指朴日昇）拱衛，穩若泰山，可是咱們也不是無機可乘，試看萬戶長普奇他們暗中與他作對，便可知道元廷皇帝爭權傾軋的混亂情形。正因此故，我才醒悟趙師伯當日為何不殺死南奸商公直之故……」

……

薛飛光道：

「咱們把普奇他們約了去，將來就是朴日昇寢食難安的禍根了。」

裴淳瞠目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薛飛光道：

「普奇不但是蒙古人，而且他是擁護另一股勢力之人，目前雖是鬥不過朴日昇，但將來說不定會得勢，甚至普奇擁護的人會做皇帝，那時朴日昇便不能在中原存身了！」³⁹

薛飛光這位女主角就是文本書名的「纖手」之一，她所馭的那隻龍，可能指

38 參見司馬翎《纖手馭龍》（臺中：文天出版社，1983年3月），第2集，頁492～493。

39 同上註，頁582～589。



元廷這隻惡龍，也可能指她所統率的中原抗元群英，包括男主角裴淳在內。薛飛光一副縱橫家的模樣，要利用元廷的內部矛盾轉為抗元勢力所用。元廷內部誠然有鬥爭，只不過是否把鬥爭層級提昇，將內部矛盾擴大成敵我矛盾呢？若然，薛飛光才有使力之處。不過，文本作者大可不管真正歷史為何，在他描繪之下，普奇很自然地就把敵人（朴日昇）的敵人（裴淳所代表的窮家幫勢力）視作自己盟友，而甘為所用。

另外，普奇所組的「宇外五雄」這一稱號、倒是很耐人尋味。宇是指中國文化所及的邊界，宇外指的是中國文化以外的世界，這五位人士是以域外之人參加中華抗元同盟的。朴日昇出身被蒙古征服的被殖民者，只因裙帶關係掌握權力而升格成殖民主，相反地，普奇出身殖民主的蒙古人，卻為了對抗內部的霸權集團，不惜與被殖民者的漢人反元團體合作。這些都亂了殖民主與被殖民者關係的套。這是《纖手馭龍》一書不俗之處。

不過，裴淳之接納普奇的友誼還不只是革命者的策略結盟有以致之，還涉及他在觀感上覺得普奇是位光明磊落的英雄人物，彼此才產生重英雄、惜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感。這點有點像之前薛陵之於石田弘的感受。所不同地，薛陵與石田弘的聯袂冒險只佔書中一個情節，不像裴淳和普奇從全書第二集結識開始，一直到全書結束的第四集末尾都一直並肩作戰的。

裴淳與普奇的結盟摧毀了漢蒙之間所構築的國族主義邊界。司馬翎的歷史想像在不經意之間創造了歷史的不可能，或說創造了歷史無限的可能。

在裴淳與朴日昇兩大漢、蒙勢力之外，另有一位奇女子叫辛黑姑，糾合武林各門各派組成第三勢力，從而達到了攪局的目的。裴淳的師叔李星橋有一次對裴淳說：

「辛无痕有女（按：指辛黑姑）如此，也值得她驕傲的了，可惜那女孩子只憑她的喜怒愛惡行事，全然不曾想到天下安危，漢族復興的機運等問題」⁴⁰

李星橋固然不脫國族主義思維以批評辛黑姑的行徑，但重點是辛黑姑全然沒有國族主義的心理負擔，對她而言，她只對爭霸武林有興趣而已，國族、國族，於她有何哉！？辛黑姑的率性，在某個層次上，比起自陷國族思維窠臼的薛飛光，更加吸引讀者目光。司馬翎對辛黑姑的塑造可說相當獨特。

40 同上註，頁 744。



四、操作精緻的歷史元素

武俠小說的故事背景多半離不開古代中國的歷史場景。司馬翎的說部十有九部發生在明代，但前述已及，他在經營地方聚落的描述上，欠缺明代社會/經濟史的知識，故爾使他在言及特定聚落的旅遊設施上不能貼合明代的實況。不過，這點到了另一武俠小說名家雲中岳身上，情形則有了極不平常的改變。

雲中岳略晚於司馬翎從事武俠小說創作，但整體創作時間持續之長超過司馬翎多多，故爾作品量相當豐富。他從 1962 年起到 1980 年止，所有作品的故事都置放於明代。臺灣史界對於明代史研究在 1980 年代以前仍相當貧乏，有之多係大歷史敘述的政治史，少有涉及社會史或經濟史，更乏小歷史。雲中岳的明代俠情故事文本中，本本的故事場景沒有不嚴謹考證而出之的，他儘量蒐讀明代的史籍，並旁及筆記小說，只爲了從中汲取明代政治、社會，以及經濟的資訊，從而取以當作從事小說創作的材料。從這點看，他不失爲是一位學究在講武俠故事，他鑽研明史的功底相較於若干位當代出色當行的明史專家，絲毫不遜色。

雲中岳每部說部的故事場景，很顯然地，他都事先作足了準備功夫，亦即讀了相關的方志。他對於明代的人出門五件事，即「車船店腳牙（衙）」，相當精通。他有部書：《劍影寒》的男主角即是某車行的車把式，於一次長途出差期間無端捲入江湖仇殺之間。他有好幾部書以南京爲背景，南京城郊有個著名的港埠兼碼頭，叫龍江關，該處有許多船行。關於旅店，雲中岳往往指出店的規格超過客棧。有部作品即說：「棧與店，品流相去甚遠。」⁴¹至於牙行，是指從事中介業者。有多部作品寫到主角偽裝行商身份者，多少要跟牙行打交道。這些相關的明代交通、商業設施知識均不見於其他武俠小說。

雲中岳對於故事地點考證之精熟不亞於專業史家的水磨功夫。像《湖海龍蛇》這部作品，寫於一九九一年前，以崑山和洛陽爲故事背景。洛陽這座府城在明代開國百年後的情況如何呢？據雲中岳描述，如下：

「目下的城池，是本朝初改建的。城不大，僅比永寧（縣）大一倍而已（城周八里）。城外，各處古蹟所在地，皆形成市集，幅員比府

41 參見雲中岳《湖海龍蛇》（臺北：皇鼎，1991年7月），第2集，頁395。此書實際創作於一九八〇年代。



城大兩三倍。」⁴²

相較於司馬翎寫杭州、台州兩座府城，只及名字不及其他，雲中岳卻能具體寫出一座城的大小，並附有數字，真是令人嘆為觀止。作者還講到城中重要設施是「伊王府」，且府邸之大佔了全城之半。這樣的都市結構，光憑想像無法想像得到的。更重要地，作者告訴讀者，江湖人物不敢在城裡鬧事，反倒很謹慎地選擇城外各市集活動。關於城外市集，作者提到安樂窩和龍門鎮這兩處，它們的功能在於方便旅客前往關林、龍門石洞，以及香山寺等名勝。在此，尤令讀者覺得作者對於明代洛陽城熟門熟戶的是，他竟然指出安樂窩和龍門鎮這兩大市集的旅店生意是欠佳的。洛陽是明代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作者將該地住宿情報研析若此，不得不教人佩服萬分。

府城之外的聚落結構，除了市集之外還有村落。雲中岳對於兩者的佈局還有如下描寫：

安樂窩至關林，約十里左右，沿途村舍星羅棋佈，官道寬闊平坦，白天前往龍門的外地遊客甚多，晚上卻鬼影俱無。那時的關林，只是一處小小村落。⁴³

窩是個市集，從它前赴名勝的關林，路途十里，沿途布滿村舍，目的地的關林是個村落。他暗示讀者，無論是旅遊地的關林，抑或是途中的村舍民宅，都是不能提供休憩和住宿的。這樣的明代旅遊知識就不是前述司馬翎所能瞭然的了。

安樂窩是遊客投宿的好所在，它有上佳的旅店，據文本描述女主角投宿情形如下：

她投宿在安樂窩的東都老店，那是河南岸最具規模的高尚旅邸，位於街東面臨大街，店前的停車駐馬場，就有三四畝大小，錢囊不豐的旅客望之卻步。⁴⁴

那安樂窩又是一個怎樣的鎮市呢？據文本描寫如下：

安樂窩是橋南的市集，早已形成頗像樣的市街，商旅來來往往，本來就是名勝區。但真正前來瞻仰吾家先生邵康節安樂窩故址的人並

42 同上註，第2集，頁341。

43 同上註，頁365。

44 同上註，頁395。



不多，那是騷人墨客的事。往來販夫走卒，對一代大賢吾家先生，沒有多少印象。⁴⁵

再回到府城的描寫：

西關與西關外的一帶城外街市，才是府城真正的商業區，市肆繁榮，商旅雲集。⁴⁶

也就是說，府城外才是商業區，這教一般不兼學究的武俠小說家如何得知明代中州府城的實際經濟運作情形呢？這點，是雲中岳在一眾武俠小說家中鶴立雞群的所在。莫說武俠小說家了，即令明史專家對於明代旅遊課題的掌握還是這近六、七年的事⁴⁷，不想，雲中岳對於掌握明代旅遊情報還是先驅者，而且在其中浸淫三十年之久。雲中岳倘要仰賴明史學界提供旅遊知識，恐怕他這一輩子都休想經營其武俠說部了。

講到洛陽，有兩樣東西不能不提：一是城中的天津橋，另一是城郊的邙山、或是北邙山。關於前者，作者如此描寫：

那時，天津橋（上源橋），皆因春夏水漲而拆除，設有渡船往來。渡船甚少，也不是往來要津，等渡船要等上老半天。南來北往的旅客，通常經過仁惠橋。⁴⁸

洛陽城被洛水切割成南北兩部，溝通南北兩部的交通動脈在隋唐之時是天津橋，在明代已換成仁惠橋。這種鉅大變遷也虧得作者細心指出。至如北邙山，文本如此敘寫：

邙山本來是禁區，禁區指歷代皇陵那一段山嶺。邙山不是一座山，

45 同上註，頁 410。

46 同上註，頁 441。

47 目前台灣史界研究明代旅遊史的先驅之一是五年級生的巫仁恕，寫有〈明代旅遊文化〉一文，收載氏作《品味奢華》（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年）第四章；另外有兩位三年級生的明史學者，即吳智和和林麗月，分別在文化史學所和師大史學所指導七年級研究生的機會裡，分別生產有林利隆《明人的舟遊生活》（臺北：文化史學所碩論，2004年），黃明莉《明代江南的遊觀文化與社會心態》（臺北：師大史研所碩論，2003年）兩文。再者，筆者指導的兩位碩士生，一作明代西湖如何成為全國旅遊第一品牌，另一作清代黃山旅遊聖地的建構，都在2009年申請畢業。另外，吳智和不是光說不練之輩。他開發明代旅遊的課題甚早，發表有〈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20卷第一期（2002年6月）一文。凡此均見明代、甚或清代旅遊課題是近年才端上枱盤的課題。

48 同前註 41，頁 448～449。



而是一連串地跨三縣的山嶺丘陵。北邨，指府城以北的幾座山嶺而已。⁴⁹

作者之所以不惜花篇幅描寫城裡、城外的景致，不是爲了多賺稿費，而是與主角行動的場景有關，故爾順筆爲之。不過，這個順筆寫將起來可一點都不滑順，有賴作者翻檢相關書籍才能筆之於書的。這樣耗費時間鑽研場景，也只有這麼一位名家罷了。一般武俠小說家是不作興用功唸書的。

雲中岳的說部聚攏起來看，明代的版圖可說一覽無遺，大江南北的地方情狀全入讀者眼簾。不僅如此，作者筆觸所及尚遍及明帝國的四裔，書中主角萬里投荒，與邊地民族產生恩怨情仇的事所在所有。本文礙於篇幅只舉《湖海龍蛇》一書爲例，餘不贅述。

一九八〇年以後，雲中岳的讀史功力往清代走去，開始製作十餘部長、短篇武俠說部。這個朝代的滿漢衝突一向吸聚讀者的目光，雲中岳的文本也不例外。滿州人殖民統治中國的情形，以三十餘萬八旗兵駐守全國重要府城，各地滿軍與漢民的居處情形如何，關係到滿漢衝突的地方版具體情形。有太多的武俠小說家以清代爲背景，但就只有雲中岳一人老老實實指出各地滿軍聚落與漢人原有社區是分開的，也就是各地八旗兵駐防、生活在滿城，而不是與原有漢人所居的府城混雜在一起，這點真實指出滿州人的殖民主義的特點，真是大開讀者眼界不說，中文世界的清史專家尚未瞧出此中竅門，更是證明作者在治清史上到了目光如炬的地步。亦即，在滿清殖民主義這個課題上，小說家較之專業史家反倒走在前面。⁵⁰

《俠影萍蹤》的故事發生清廷才開始統治中國的三十餘年之時，地點集中在襄陽府，該文本如此描述該城：

襄陽府城元氣恢復了，城內已看不到斷瓦頹榑，市面繁榮，一片昇平景象。流寇把襄陽的人殺掉了十之九，目前，第三代的人正在成長。往昔的襄陽衛衛城已經改爲滿城，現在稱爲新城，位於府城的東北角，是滿人的住地。⁵¹

這是一個滿城，可以清楚看出滿漢不同住。

49 同上註，頁 490。

50 國內懂滿文的兩位資深清史教授如陳捷先和莊吉發，以及年輕一輩的清史學者如葉高樹和吳志鏗，他們的研究都沒觸及殖民主義的課題。

51 參見雲中岳《俠影萍蹤》（臺北：春秋，1981年11月），全一冊，頁7。



《一局殘棋》的故事發生在雍正九年（1731），地點在濟南府。這裡也存有一個滿城，據書中敘寫如下：

那時，滿人的住處限於滿城，滿人只在大都市定居，大都市必須劃出滿城讓他們居住，不與漢人雜居，以避免被漢人同化。⁵²

雲氏又一作品《古道照顏色》的故事發生在明隆武帝死於福州兩年後，可知是在順治帝治下，地點是在汀州府，同樣也有一個滿城，據文本描寫如下：

滿城也就是往昔的汀州衛舊址，該衛的官兵已經煙消雲散，被改建為滿城，形成本城的特別區，漢人嚴禁接近。滿城有自己的官吏、兵馬、警衛，完全以統治者的面目出現，被徵召任勞役的漢人，就是滿人的奴才。⁵³

還有一文本《碧血江南》的故事發生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冬，地點集中在鎮江府。鎮江府也有一個滿城，首長叫江寧將軍。下轄滿城守備大人，以及鎮守京口的一位將軍。在這裡，作者只講到滿城的滿州人也同府城中漢人同樣過漢人習俗的年節⁵⁴，而不及滿城與府城的地望關係。類似滿城的即景寫生，在雲氏清代作品中所在多有，不暇遍舉。

雲中岳於下筆前先鑽研出歷史知識，再憑以寫入他的說部中，形成故事場景的寫作材料。這樣的作法比起不唸書，或說不研究歷史的其他武俠小說家，雲中岳作品的寫實主義風格異常濃郁，迥異於一般以浪漫主義為基調的武俠小說。司馬翎就是不具有明代聚落結構、以及旅遊設施的歷史知識的緣故，他才會憑空杜撰出村中有旅店的情節，而對於府城、縣城、鎮城的等級化結構和各別情況也因毫無究悉，故爾城名只具地理座標的功能。在司馬翎敘寫之下，城市的景況只限於飯館、旅店，一方面專供小說人物食宿之用，另一方面則是武力衝突的重要場所。然而，這兩點都不合史實之甚。

五、下層社會意識型態的躍動

從意識型態而言，雲中岳與司馬翎對照得相當搶眼。從前述已知，司馬

52 本作收載雲中岳《咆哮邊城》（臺北：春秋，1982年3月），全一冊，頁263。

53 參見雲中岳《古道照顏色》（臺北：春秋，1981年1月），頁12。

54 參見雲中岳《碧血江南》（臺北：皇鼎，1999年1月），第4集，頁712。本書疑寫於1990年前後，本文所據版本乃再版者。



翎的俠者無論是在抵抗倭寇上與官方一致，還是在反抗蒙古人統治上合乎漢族國族主義的主張。在此，可以看出司馬翎是在複製金庸「爲國爲民，俠之大者」⁵⁵的文化論述。

雲中岳於此則另闢蹊徑。在明帝國時期，雲中岳所創的一眾男俠、俠女，是與官府對抗的。在清朝殖民統治中國時期，他創造的群俠走的是目無政府的文化政治道路，這與一般武俠文本所標榜的國族主義霸權論述大異其趣。

出版於一九六八、六九年左右的《匣劍凝霜》⁵⁶，敘寫的是明武宗朝的山東響馬賊之亂。由江彬統率的大同邊軍應朝廷之請遠赴河南平亂。有一次，官軍緊躡賊軍之後進入一座村莊，不想官軍竟然屠村。該村有一艾姓人家世代行醫，只除了長子艾文慈因事外出，逃離大難，艾家男女長少悉數被殺。艾文慈返家始知官軍所爲，從此，他誓言除了擒殺響馬諸酋外，更重要的擒殺對象乃是江彬。然而，江彬因平賊有功受寵於武宗，從此不離皇帝左右，很難殺得了他。另一邊，大內高手奉命追殺艾文慈。艾文慈是全國捉拿的欽犯，他卻要與官方和賊方兩面作戰。這樣一位殺官的俠士，在三百多位臺灣武俠小說共同創造的武俠世界是極其少見的。雲中岳的創作模糊了一條官賊分明的界線，在艾文慈這位俠士看來這條界線已泯滅無存，官賊根本難分，艾文慈既殺賊，也砍官。從另一邊看，艾文慈則是官賊雙方皆欲置之死地的公敵。

類似這種官賊俱反的俠士，是雲中岳小說世界中常見的角色，非獨《匣劍凝霜》這部說部而獨然。

在以反清爲主題的武俠小說中，漢族國族主義是所有作者所欲打造的文化論述。這一論述早已取得正統的地位。儘管它存在清朝盛世，但後代的作家總是誇大漢族國族主義在清代的作用。

到了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之時，雲中岳已經創作了十九部以上以明代爲背景的長篇武俠小說，這時他突然創作了一部以清代爲背景的長篇武俠小說，叫《江漢屠龍》。該說部發生於乾隆六年（1741），地點是在武昌。該城有三位代表清廷利益的武技高手在駐防，叫「武昌三霸」，老大是漢人，老二

55 參見金庸《神雕俠侶》（臺北：遠景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第二冊，頁826。原著出版於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之際，故爾筆者才說台灣的武俠小說家在複製金庸式的武俠論述。

56 該書版權原屬四維出版社。我所根據的版本是皇鼎書局在1990年代的盜印再版。我原本擁有一九八〇年代的皇鼎盜版，2002年時被巫仁恕索取去了。



是滿人，老三是蒙古人。他們是屢破反清復明組織的幹練之士。反清團體奈何不了他們，乃設法引出江湖一位神秘的俠盜來協助。這位俠盜有個公開的身份，是南京江邊一位漁戶頭兒，麾下有一、二十家漁戶，但他的隱藏身份是劫富濟貧的江洋大盜飛天狐。這位義賊依計前赴武昌，先是設法擊斃老三，再引其他兩位來追殺他。這位義賊一路沿江東逃，到了九江地界乃設謀一一除掉武昌三霸的老二和老大。

飛天狐這次行動多了一位女性助手從旁協助，可惜中途在一場戰鬥中受傷而死。她在死後，飛天狐感慨之餘，說道：

……她的歸天，向世人用鮮血來證明人心不死。可是人心已經死了百餘年，人心在烈皇梅山上吊時已經死了；不遠在大明皇朝寵幸魏忠賢的時候就死了，她沒有死得安詳的理由。⁵⁷

這番話已清楚道出明朝的子民無須對明廷忠誠的理由。

武昌的二霸天挾著公門的優勢警力，再加上有俠義道的協助，組成一支近二百人的獵狐大隊，尾躡飛天狐之後，無如飛天狐棋高一著，把這支獵狐大隊整得七葷八素，最後死傷慘重，連主事者全都死亡殆盡。這次官方加白道的組合竟然鬥不過一位俠盜。武昌清廷勢力一時爲之動搖，但大勢所趨，漢人還是要在滿洲人統治過活一、兩百年。飛天狐對反清秘密團體的協助，其實意義不大。他自己本就沒有要走上種族鬥爭的戰場，他自關的戰場走的是階級鬥爭路線，要當一位利濟天下的義賊，好與官方周旋。

這部說部在所有陳腔濫調的反清復明武俠說部中算是別開生面的一部作品。這開啓了雲中岳繼續批判反清復明這一文化論述。一九八六年二月，他推出一部更臻成熟的作品，叫《莽原魔豹》。它的時間定位在順治帝入關統治中國的第四年（1647），地點全在山西省境內，隨著主角的足跡展開，故事場景一路從潞州府往北至大同府的五台山，綿延展開在讀者眼前。

本書的主要情節集中在十歲大的順治皇帝到五台山禮佛，引起前明忠臣後代和流寇餘孽的覬覦，紛紛上山準備狙擊皇帝。主角乃途經該地不幸被捲入此一風暴中心。這時華北大抵底定，華南仍有南明的勢力在抗清。主角是位山野獵人，十歲時父親被拉伏到邊牆去抗清，從此伶仃孤苦在人海中勉力維生，所以，他對明廷沒有任何好感。另一邊，滿洲皇帝身邊的維安系統空

57 參見雲中岳《江漢屠龍》（臺北：皇鼎，1986年5月），第1集，頁117。



前龐大，有大內高手、大同軍方人員，府州警力，以及江湖白道群俠，就中，有三位滿洲師兄妹，叫「燕山三劍客」，武功最高，予各方想行刺皇帝的漢人劍客很大的打擊。

有一回，主角邂逅燕山三劍客中的師妹，這時她是女伴男裝，她懷疑主角是「僞民」，意即南明抗清團體。主角則表明自己無辜被捲入風暴，且說既然清方人員對他先動手，他有權自衛，並還以顏色。這位燕山女劍客則目此行徑為「大逆不道」，是「目無君父」。主角則回敬以下的話語：

去妳娘的目無君父，妳這廝長得倒像個人樣，卻是天生的豬狗奴才。什麼叫做君父？君父就可以胡亂殺人？沒有我們這些人，他算誰的君父？民為貴，君為輕；君視民如芻狗，民視君如寇讎，你懂不懂？混蛋！⁵⁸

在另一個場合，文本作者安排主角與小皇帝見面談話，結果是雙方都不能說服對方，皇帝故示大方讓主角離去。迨主角離去後，皇帝交代隨侍身旁的燕山第二劍客，不許主角到紫禁城鬧事，還說：

……這個人無父無君，無神無佛，五台千餘年佛門聖地，他居然敢在此地殺人放火，人神不容。⁵⁹

這兩處都在在指明主角是位目無政府的人，他以這樣的人生哲學應付明清變革的歷史大事件。

還有一處，文本作者安排主角思索前程，他回憶一生，大明皇朝沒給自己好日子過，繼而大清皇朝建立，社會秩序恢復，每座城市向「復原的太平日子邁進」，自己反而參加強盜集團在殺人放火。最後他把民族大義抬出來做擋箭牌，又不把自己看成大明的孤臣孽子⁶⁰。這表示主角做不做大明遺民，內心還是很掙扎。

本書最特殊的地方還不是在於男主角持目無政府之姿態用以處世，而在於異族書寫上突出了滿洲人的英雄形象。莫說最後「燕山三劍客」個個都壯烈成仁⁶¹，即使有位混入抗清團體的滿洲奸細，在被人快要識破身份後，先一步道出自己並非「漢奸」，而是正牌的滿洲軍官，他的說詞如下：

58 參見雲中岳《莽原魔豹》（臺北：皇鼎，1986年2月），第3集，頁653。

59 同上註，頁681。

60 同上註，頁682～683。

61 同上註，頁908～913。



內三旗正白旗一等一級御前帶刀侍衛，舒穆祿兆豐。⁶²

他並表示，他雖拜漢人爲師，但在「國賊不兩立的君父大義之前⁶³」，必須殺掉師父。還有，他咒罵抗清團體爲「無君無父的叛逆」。

雲中岳並未把滿洲勇士形容成貪權嗜殺者，這在當代說部的異族書寫的文化工業中，是一大異數！

出版於一九八五年八月的《碧血江南》的故事置放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皇帝第三次南巡的事件中，皇帝身邊維安系統與反清團體的天地會、小刀會在此事件中逞兇鬥狠。這回男主角是江湖神秘人物的「雷神」，他的公開身份在書中未做交待。雷神又是怎樣的一個人，是一個他自稱邪魔外道的人物，有一次他與一位明清之際賣友求榮的人談話，當對方大言不慚說是替朝廷立功時，男主角打斷對方的話，說：

我不管你替誰立功，也不問誰造反。那不是我願過問的事。我只是一個遊戲風塵的江湖行道者，可是並不怎麼無損正直的浪人，管了閒事頗爲重視有始有終……⁶⁴

有一次，一位天地會的人自承是「老桂」，如此恭維男主角：

雷神雖說是一個執役小神，但也代表神權和正義，不錯嘛！能替天下主持正義懲惡除奸嘛。

男主角反倒自我調侃地說：

我自己就年輕衝動，任性魯莽，連黑白都分不清，還知道甚麼叫正義？別開玩笑。⁶⁵

男主角就是不願接受對方送來的高帽子，他有意自外於這場明清衝突的是非之外。

當對方有意收編主角時，主角敬謝不敏，如下：

你們唆使一些匹夫之勇的人作暴民，遊說一些遺老出來號召，有甚麼用呢？無計畫無長遠打算的暴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能枉死不少菁英，讓人分而殲之一一撲滅。孤臣淚已盡，遺老已凋零；沒

62 同上註，頁 730。

63 同上註。

64 參見雲中岳《碧血江南》（臺北：皇鼎，1999年1月），第1集，頁93。

65 同上註，頁 495。



凋零的也遁世或苦度餘生，哪還有能力號召？⁶⁶

本書真正的高手是負責維安工作的滿洲大臣德都桂齊，麾下是南巡江南靖寇指揮使章佳巴延的次女，達春格格。這雙男女滿洲人在雲中岳筆下智勇雙全，難怪抗清團體不足成事。

有一次達春格格與男主角對話，談的是暗中勾結清廷的白道英雄，遂激發出滿漢衝突的火花，請看底下摘錄：

「……而我，卻認為他是表面仁義英雄，內心男盜女媚的狗娘養的雜種。」

「你這是叛逆口吻……」

「你給我閉嘴！」他怒吼：「我並不反對你們滿人做皇帝，也不反對你們表面上叫的什麼滿漢一家。這只怪咱們漢人不爭氣，自己人打打殺殺，把你們請進關來做皇帝。我只是一個平凡的遊戲風塵浪人，我不介意你們公開的殺戮，只要你們殺的人不是我。我也不在乎那些人助紂為虐為非作歹，只要受損害的人不是我。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我必須做我認為天理國法人情管不到的事。我不介意你指證我是叛逆，那些無損於我風塵怪傑的人格與尊嚴。……」⁶⁷

文本作者等如又複製了一次目無政府之文化論述。《碧血江南》的人物造型和主題，其實是《莽原魔豹》的再延伸，連行刺皇帝的戲碼也同樣複製了一遍。

一連討論了雲中岳三部抗清長篇說部，都在在指出作者跳脫國族主義的思維，而突出了階級意識所蘊含的社會正義這一文化論述。雲中岳所塑造的明清俠士，在明代是反官方的，入清之後，他的俠士懶得管復興明廷的大業。這跟司馬翎的俠士，在蒙古人治下必定反異族統治者，在漢人治下的明朝，也必定協助官方去抵禦日本這個外患。司馬翎跟一般信守國族主義思維的作家不同的，僅是在國族論述思維之下所進行的異族書寫超脫了一般刻板印象，以為異族全是貪利嗜殺者。

一九八七年三月，雲中岳推出《紅塵碧玉》⁶⁸，故事時間設定在康熙二十

66 同上註，頁 496。

67 同上註，第 4 集，頁 856。

68 該書由臺北皇鼎出版社於 1987 年 3 月出版。



一年（1682），三藩之亂結束後一年，地點就在飽經兵燹的湘潭縣城及其周遭鄉鎮和山林。這裡是明朝忠貞之後和流寇餘孽爭食地盤之處。代表清廷的兩股勢力：一要李自成的寶藏，另一要偵破反清勢力為主子報仇，兼作奪寶之計。男主角是一位神秘人物，外號叫「報應神」，他來此地湊熱鬧是爲了消滅流寇餘孽。另一股邪惡勢力是一位假冒明朝忠貞之後的一位女性帶頭。這一男一女周旋於清廷勢力、流寇餘黨，以及反清勢力之間，將反清復明的論述揶揄個夠。各位看倌試想，邪派人物冒充前明忠良後人，反清勢力結盟對象竟然是流寇黨羽而不自知，江湖神秘人物（按：代表的是目無政府的文化論述者）爲的是打擊殘寇勢力，而清廷勢力假公濟私的是要發財。這一幅圖像把一向熱鬧的反清復明劇碼顛覆個夠。反清淪落至此，也沒什麼好書寫的了。雲中岳的清代俠影書寫系列計畫就此結束，此之謂歟？

※ ※ ※

武俠小說離不開以古代中國爲構築的歷史舞台，既然中國歷史是武俠說部必要的材料兼道具，中國歷史知識對於武俠文本作者的歷史想像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憑藉。司馬翎的歷史知識顯然不脫官方形塑的國民歷史知識範疇，對蒙古人、對倭寇只停留在國族論述下的浮面認知；對於官方或是史界來不及提供明代聚落結構以及旅遊設施知識的前提下，他的歷史想像只能取樣於臺灣上一世紀六〇、七〇年代的現實世界，誤以爲村落也有茶樓酒肆。至如雲中岳則不然，明清時代的聚落結構和旅遊設施，再加上滿洲人軍事殖民統治模式，全是他自行研發出的知識，故爾故事場景的細節鉅細靡遺，令人嘆爲觀止。同時，他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國族論述霸權籠罩的時代，也能自出杼機想像明清時跳脫國族思維的人應大有人在，而造就了目無政府文化論述的俠盜、或義賊型人物。這些都讓雲中岳在現代文化史頁上佔有巨人般的地位。

六、結 論

從某一方面說，武俠小說家是賴歷史知識維生的，但作家的歷史素養是隨人而異。一般而言，一般作家只具備高中歷史知識的水平，這是有學者所



說的國民歷史知識範疇⁶⁹。本文所取樣的司馬翎代表的正是其中一個不算典型的例子。無論這類作家如何努力創作，就是無法擺脫國家在他們腦海中所灌輸的國族論述這類的意識型態。當這一類作家在其文本中暢談、或縱論異族時，黨同伐異的異族書寫就成了寫作的基調。其次，這一類作家，對於史學社群所研發的專業歷史知識，諸如明季海盜和元末江南文化菁英的政治立場，無從獲知，故爾不知援用、甚或挪用。但是這類作家中有極其少數，譬如司馬翎即是，他畢竟是位較有創造力的作家，他可讓他的國族論述容許少許變調，並未一味將異族描寫成貪利的嗜殺者。關於大歷史敘述的架構，他只能複製國家教給他的那一套。至如小歷史敘述架構，凡涉及地方情狀、人民私生活領域的部分，他再如何具備想像力，就只有束手無策的份，只得胡亂將當代臺灣現實元素擅自植入明代社會中去。

雲中岳則屬另一類作家。他是位業餘歷史研究者，他將一己的研史心得譜寫到他耕耘的明清社會中去。他使故事場景栩栩如生不說，抑且作到了讓街道、市容纖毫畢露的地步。他自創一格的明清俠士型格，完全與一般說部所說的俠是功成名就的社會身份表徵，有所不同。他所創的俠士是要隱匿身份的，毫無社會酬報可言。還有，雲中岳在再現明清旅遊文化和滿洲殖民主義這兩頁歷史上，意外走在專業史家的前面遙乎其遠。這理應會讓專業史家汗顏。幸而專業史家與歷史小說家之間不相來往，所以也不存在這裡所說的問題。最後，雲中岳將明清鼎革的歷史框架作為創作元素，但明清的衝突不再是國族論述的一言堂，他反而突出了目無政府的文化論述，作為由他一手所創的俠盜安身立命之所在。臺灣的國族主義教育在雲中岳身上，形同國家教育的破功。

對於歷史知識，專業史家與武俠小說家之間並未形成供需關係。武俠小說作家或撿食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餘唾，或是自食其力自行研發。另一方面，國家與史學社群或武俠小說家之間，其間關係或緊密、或鬆散，完全取決於文化菁英個人是否具備獨立的人格。

69 關於高中歷史課本如何被形塑成國民歷史知識的過程，請參見盧建榮《從根爛起》（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一書。

